

“袭貌遗神”：晚清民初的一场话语革命
——评《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

周 振鹤

社会的发展会使语言不断产生新词语，或者将旧词赋以新意义，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候或不同文化接触交流时候，这种现象就更加显著。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新词语（包括旧词新义）快速出现的时期，但都未能使中国基本话语系统受到根本性影响，或者说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可是在晚清民初却发生了一场话语革命，使得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与西方的近代话语系统接上了轨。一般人也许都注意到，这一时期中国直接或间接引进了大量来自西方的新词语，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新词语的产生对旧的话语系统有颠覆性的作用，因为这些词语在当时都是关键词，使用频度之高，前所未有。虽然时至今日，新词语的产生仍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并不是以改变我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因此我们不易体会到晚清民初时期的特殊性。

晚清以来由于西方与中国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于是大约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许多新事物与新观念迅速传入中国，旧有词语已经不足以表达这些事物或概念，因而新造词与旧词改用新义的现象不断发生。与此同时，东邻日本也因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比中国更快地更多地吸收西方事物与观念，同样地制造了许多新词语。由于日语采用汉字作为中介，并且历来视汉文为雅，视日文为俗，日本的洋学家又多有深厚的汉学根底，因此对西文词语很少采用音译，而是用汉字组成新词，或利用汉语旧词来翻译西洋新观念。这样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就发生了新词语的交流现象。我过去已经说过，大致在明治维新以前，这类新词语主要是由中国流向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双向都有，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则是单向地从日本流向中国，而且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此中国流向日本的新词。

这些新词中以汉字组合而成的，如“干部”，如“场合”，虽然起先中国人觉得生硬，不习惯，但久而久之也就照用不误了，而且不会发生歧义与不断尝试改译的问题。但赋旧词以新义的情况就不同了，如 democracy，如 liberty 都是中国日本从来没有的概念，但却用“民主”、“自由”这样的中国固有词语来翻译，在起初都不免使中国人觉得难以接受。因为这些中国词语的原义是与西方的概念大相径庭的。民主在中国原是“民之主”的意思，也就是说皇帝、县令这样的人就是“民主”，但用此词来译 democracy，却变成近乎“民为主”的意思了；而“自

由”在中国本来带有胡来，随心所欲的意思，却用来表示西方一种美好的政治理念，这叫中国人如何能顺利的接受。再如以“经济”译 economy，以“封建”译 feudality 一类，也使中国人觉得十分的别扭。因为“经济”是经邦济民的意思，有政治的意味，与财政事务毫无关系；而“封建”则特指封邦建国的制度，是商周时代的历史现象，但 feudal system 在欧洲却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一种社会形态。职此之故，中国人起初对日本学者的这些译法都不以为然，而自行将 economy 译成计学、理财学、平准学、富国策，但都没有站住脚，liberty 早在日本人译为自由以前，就有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 Morrison）译为“自主之理”，在日本也有人译成自主、自在，但也没有成功。

由于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汉语汉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的稳定性，汉语词义的渐变虽不乏见，而突然改变是要经过尝试，引起迟疑甚至抗拒的过程的（这其中有不少实例，这里不能细说），所以许多“袭貌遗神”——即旧词形式而包容了新义——的词语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里是常常新旧义并存，在表示新义时，往往要加以注明，以免读者按旧义去理解，如中文杂志上最先出现“经济”一词是在 1896 年 11 月 11 日的《时务报》上，但使用者并非中国人，而是日本记者古城贞吉，所以在该词下还要用小字注明“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但是其时世变过亟，求新求变的愿望十分强烈，促使新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几乎是无孔不入，所以大约在一二十年之后，旧词义已经荡然无存，一场话语革命就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而且这一场革命的结果并不与知识精英的愿望相一致，许多容纳义的旧词的新词在他们看来是很不合适的。上面说到的“自由”一词不但在中国，在日本就已被认为是有劣义，但却被普遍接受。而在中国甚至像严复、梁启超这样的大人物所创造的许多译语也归于失败。

如严复为了避开“封建”一词，起初特意自造音译的“拂特之制”，但久而久之，也坚持不下去，而改用封建了。梁启超千方百计想避免的“经济”新义最终还是避免不了，也只好和光同尘，从俗使用了。所以发生在晚清民初的这场话语革命并非一场平静的革命，而是颇带有点狂飙式的革命，以至许多译语来不及仔细琢磨就匆匆登场了，免不了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完全显示了一般革命所不可避免的一样特点。最具讽刺意味的正是“革命”这个词在清末竟然极为时髦，而又完全脱离了其原义，从原来王朝天命的更替变成国民推翻统治者的行为。而且更发展为“宗教之革命”、“道德之革命”、“文学之革命”，与旧义毫无关联了。这是很令当时的知识精英们不大满意，但又无可奈何的。梁启超虽然提议用“变革”来取代“革命”，但根本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以至他自己不久也大唱“小说之革命”之类的口号了。

这场话语革命的重要意义就是中国人在近代化过程中已经在观念上与西方接了轨。不管接受不接受这些观念，你已经在形式上认同了有这样的观念存在，也许时人对 democracy 与 liberty 的理解还与西方的原来观念有距离，但他们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却与中文的原义完全背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了。因此这场话语革命的结果就是中文语词的旧躯壳里已经装进了西方观念的新灵魂，很显然现在还有谁会有民主是皇帝，自由是胡来，经济是政治的感觉呢？所以或者说我们已经先在话语系统方面近代化了，而后才在行动上走向近代化。如

果我们将这一段对外来观念的接受史以词语翻译史的形式来进行研究，反映出清末民初时期对西方观念表示犹豫迟疑，以至于服膺接受的过程，应该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好题目。德国著名汉学家李博（W. Lippert）得风气之先，早在1978年就写出了《汉语中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通过对一个个术语来源的详细分析，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换句话说，李博的书让我们看到了晚清民初话语革命的一个侧面，而且是极重要的一个侧面。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据我所知，这种专门以一类学术用语作研究对象的专著，这是第一本，而且对象是我们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显得特别。此后，即八九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对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形成的研究蔚为热潮，许多专著纷纷出现，甚至有些学术机构进行长期的专门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从更广阔的方面来认识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与实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李博这本书是起了领军的作用的。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至迟在十月革命前十数年就进入了中国。还在清末，一些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已经向国人介绍了片断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在东邻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比中国人更早。可以说，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说最先都是以日本为中介引入中国的。所以李博在追寻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来源时，不得不一个一个从日语探索起。这里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一个新译语在日语里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二是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采用。李博先生精通英、汉、日语，做这一工作最合适不过，而且他个人收集了不少稀见的英汉、英日对照辞典，也便于参考引证。因此在李博书中我们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一个术语，如“资本主义”，如“阶级斗争”怎样具体进入到汉语词汇中，也可以看到在接受的过程中如何出现曲折的实例，如严复对“社会”，梁启超对“革命”新义一开始的抵制，到最后又不得不接受的无奈。当然李博所讨论的词语并非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全部，而主要是那些“袭貌遗神”的古汉语词的新义及少数日本学者以汉字新造的词语。至于日本所音译与大部分生造的汉字新词，如“布尔什维克”与“支部”、“干部”则不在其讨论之列。因为这些词的产生较简单，接受过程中所产生的曲折也较少。

要追寻一个新词的来源，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看其最早出现在那一部文献里，或更进一步，找出是谁所创造的。这就能充分理解他创造译语的思路了。如书中就列举了日本著名哲学家西周所创造的一些译语，譬如“辩证法”一词中的“辩证”部分，最早就是1874年西周在《致知启蒙》这篇文章里使用的，而“辩证法”则首见于堺利彦1906年的一篇翻译文章《科学的社会主义》。但这一条路有时不一定都走得通，因为最原始的文献往往不明，根本无法知道是谁最先使用某译语的，或者虽然明白是某文献，而已经佚失，也就无法引述。另外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困难，那就是近代文献多如牛毛，检索起来不易，除非有集体性的协作，否则百密一疏，有时也不免会有查漏的时候。如李博说：“‘共产党’一词的汉语名称最迟随着《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第1版（1908年）出版而存在。”其实该词的汉语名称1906年在《民报》第五号上已出现。又，他以为汉语借用日语“生产力”这一新词也是出于《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位中

国译者，然而该词在 1905 年的《民报》上也已经可见。又“农民”一词为中国所借用，李博以为最早是 1917 年的《东方杂志》，但早其十年《民报》已经出现许多农民的关系词，似乎应看作其时“农民”这一译语已由日本输入中国。李博书中引用了不少《民报》的用语，但彻底查清毕竟有难度，疏漏实是难免。不过《民报》有词语索引，且 1972 年已经在日本出版，以上词语皆可在其中查到，或许此索引为李博所忽略？

对于查阅原始文献方面的困难，有一个替代的办法，那就是利用当时的双语对照辞典来检索，看看某一个译语最早出现在那一年出版的辞典中，就知道此词必定出现在该年之前。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被辞典所收录，必定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了。但如果没有其他辞典比该辞典更早收录这个新词，那我们就可以大略认为这个新词出现在该辞典出版年份以前不久。李博书中用这一思路判断了不少新词的来源，也是成功的，如“社会”一词在 1873 年的《英和字汇》里尚未出现，但在 1882 年的第二版里就登场了，以是推知该词在 1882 年前已经普及。不过由于辞典与原始文献毕竟不同，要精确地了解一个词来源，就要注意到不止一类双语对照辞典，如不但要注意英日、英汉辞典，也要注意德日、德华、法日、法华等辞典，还要注意同一种辞典的不同版别，往往在第一与第二版之间就有了明显的差别。这里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看看。

如以“封建ノ”译 feudal 一词，李博说首见于《英和字汇》第一版，1873 年，就有点偏差。该译语最迟已就出现 1872 年的《英和语林集成》第二版里。这里倒不是争一年之差，重要的是因为该英日辞典的第一版，出版于 1867 年（李博注意到这一版，以及 1903 年的第七版）并无此词，由此或许可以推测出“封建”这个译语应该是在两版之间这五年里出现的。1867 年是江户幕府时期的末年，第二年就是明治元年，维新开始。世局大变动之际，新词大量出现，因而第二版的序言说，该版比初版增收了数千个新词。所以这第二版是很值得重视的。李博注意到《英和字汇》两版的差异，不知何以忽视了《英和语林集成》也有同样的情况。

再如，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原文多是德语词源，因此德日对照辞典不可不参考。我所看到的最早的德日辞典只是出版于 1884 年的《独日辞书》（这是该辞书的第二版），但已发现该辞书早已将德文 Kampf 译作“争斗”，而李博所举最早出现“争斗”一词，却举的是 1888 年从英文 struggle 翻译过来的两本英日辞书《附音插图和译英字汇》与《和译字汇》的例子，稍嫌太迟。“争斗”是后来“斗争”的前身，阶级斗争即由此词再延伸。又德文 proletarier 在《独日辞书》里译为“無産ノ民族”，也就是说其时已有“无产”一词的形式，而李博所举最早有“無産ノ”的辞典迟至 1903 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也是忽视了德日辞典的缘故。而且李博全书似乎没有一处利用到德文辞典，这一点显得有点奇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博敏锐地注意到：“李大钊不仅把‘无产阶级’看作一个社会学的概念，而且还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民族性。其理论对“无产阶级”独特的阐释就是，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民族”。这样一来，好象还显得《独和辞书》所译“無産ノ民族”有点先见之明。可惜该辞书的初版未见，如果能予以对照，或许还会有别的发现。

李博的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约占四分之一篇幅，从语言学上说明汉语如何接受外

来词语，简述现代汉语科学政治词汇以及马克思主义术语产生的历史，并列出来用来研究这些术语产生过程所用的基本材料，给读者一些最基本知识。其中有些地方可能有部分读者不太感兴趣，但却都是必要的知识，尤其是作为第一本这种类型的专著，就更显得必要。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干，用来分析一个个术语的产生与使用过程，并论及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论著中的作用，很有阅读价值。李博的书还详细分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接受西方传来这一新学说，并注意他们在接受过程中也有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出版中文版时，李博又作了一些重要的订正，一些结论比原著更加准确，尽管仍有值得商榷之处（这是任何著作都难以避免的正常现象）。中文的翻译也很不错，流畅可读，只有一些也许是笔误也许是印刷错误的地方，读者应该可以悟出，如将狄楚青的《时报》误为狄楚清的杂志《时务报》，误片假名ソ为ン，误平假名と为て等。只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名字及书名习惯于阅读其汉字形式（或汉和结合），但书中几乎全用罗马字拼写，即使日本人自己读来恐怕也不顺眼。也许是因为译者不大熟悉日语的缘故所致吧。其实许多作者名与书名在参考书目里都有，何不照搬进正文里就是？即使附录里没有的，如迫害日本共产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的桂（太郎）首相，书里写成 Katsura 将军，恐怕就没有多少中国读者知道是谁了，其实只要花点时间查一下有关工具书，是可以译成中文的。至于西方人的名字，中国人也多愿意读其中文翻译形式，但书中连大家熟悉的考茨基也几乎都用英文拼写，有点不合适。

说无之难，难于上青天。李博书中说梁启超首用之词的时间，实际上都比其所说略早。1901年《过渡时代论》（清议报 82 期）：“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政之制，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缠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此一段，“人民”、“社会”（社会 1896 年《时务报》第十册始用）都已有，而李博以为此二词梁 1902 年才用。“人民”且可能为梁首用。李博所举最早例子为 1907 年胡汉民（民意）《告非准民生主义者》（民报 12? 号，1907? 年 3 月）。

“理论”可能 1901 年由梁首用：“天下事固有于理论上不可不行，而事实上万不可行者。”（同上文），而李博所举最早为《新尔雅》。

“思想”（1899 年严复《群己权界论》有“思想议论自由”）梁 1901 年即用：“若夫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者，则政府不禁之，社会自禁之。”（清议报 82、84 期，《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且同年梁还有《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在清议报 94,95 期）。而李博以为 1902 年梁才用。

“权力”（首见 1896《时务报》）李博说梁 1902 年就用了此词，其实他 1901 即用：“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1901 年，上揭《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工人的确是中国本土词，《旧唐书·安金藏传》：“安金藏，京兆长安人，初为太常工人……自此公卿以下，并不得见之，唯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